

蒙克利夫的武汉抗战书写

吕 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 1931—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便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艾格尼丝·蒙克利夫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新西兰籍执行干事,她在汉口亲历了武汉抗战,并书写了大量书信,对1937年至1938年日本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军民和国际力量的抗日斗争进行了详细记录。蒙克利夫的武汉抗战书写不仅旗帜鲜明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残暴的侵略行径,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行动,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新西兰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深切同情与支持,并在新西兰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新西兰较早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并进而影响英美国家起到了促进作用。她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中的个人境遇和武汉抗战书写应该成为当代中新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武汉抗战;艾格尼丝·蒙克利夫;抗战书写;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3-0122-11

收稿日期: 2026-02-01

作者简介: 吕 昊(1996-),男,山东济南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3.002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国际友好人士亲历的历史事件的书写与影响在近些年来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不断被挖掘,如詹姆斯·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书写^①、约翰·拉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写^②、贝德士的战时中国书写^③等。在这方面,新西兰人蒙克利夫关于武汉抗战的书写与影响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艾格尼丝·蒙克利夫(Agnes Moncrieff)于1898年出生于新西兰惠灵顿,1922年她被新西兰基督教学生会选为全国代表,参加了当年在北平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WSCF)会议。1927年,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邀请她前往中国任职,1930年蒙克利夫以新西兰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身份赴华工作,从1930年至1945年,蒙克利夫先后在北平、上海、汉口与成都工作,亲历过长城抗战、武汉抗战等重大战事。蒙克利夫有定期写信的习惯,留有大量书信,其中涉及武汉抗战的信件主要集中在1937年8月9日至1938年10月30日,共计59封,占已公开信件总数的近四成。

国内目前尚未有蒙克利夫书信集的译本,学界也未充分关注到蒙克利夫本人与她关于武汉抗战的书写,本文以蒙克利夫书信中关于武汉抗战的书写为研究对象,从空袭与反空袭、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书信对新西兰的影响、历史记忆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探究新西兰人视角下的东方反法西斯战争。

① 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著作《中国的新生》早在1939年便在中国发行,目前从研究资料来看,主要集中于期刊,而期刊的内容则侧重研究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采访,研究成果例如杨菁:《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9-132页。

② 拉贝的日记于1997年在德国公开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当年就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见《拉贝日记》翻译组:《拉贝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拉贝日记》为重要历史证据,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研究成果例如黄慧英:《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行为及思想变化简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94-100页;张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9-94页。

③ 国内学界关于贝德士的战时书写研究相对丰富,涉及南京大屠杀、抗战基督教史、日本在华毒品史等领域。章开沅极大丰富了贝德士研究,如《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贝德士文献研究》《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专著。

一、关于空袭与反空袭的书写

“空袭”与“反空袭”是蒙克利夫在书信中涉及武汉抗战的重要话题之一。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蒙克利夫在北平工作时便记录了日机对北平的突袭情况。^①此后日机轰炸成为她书信中频繁提到的事情。1937年7月，蒙克利夫在从上海前往江西休假的旅程中得知淞沪会战爆发，遂被迫从度假地江西牯岭前往汉口。蒙克利夫于1937年8月底抵达汉口，定居在汉口的路德教会^②，她居住的地方是日机频繁光顾的地段，她的相关记录是研究日军空袭武汉的重要资料。

（一）关于日本对武汉空袭的记录

1937—1938年的中国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景。日本侵略者先后攻陷上海、南京，武汉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1938年实际的战时指挥中心，这时期武汉自然成为日本的重点进攻目标，武昌，汉口和汉阳均遭受了日机的无差别轰炸，对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日机对于武汉的空袭长达一年多，蒙克利夫公开的信件一共记录了10次较大的空袭。日机对武汉的空袭从1937年8月就已开始，日本军机分别于8月20日和8月21日抵达武汉上空，但未能实现其军事目的^③。

蒙克利夫首次关于武汉抗战中日军空袭的记录写于当年10月初，记录的是九月份的一系列空袭，也被称作武汉九月大轰炸惨案，日机分别于9月14日轰炸了汉阳一带，9月17日轰炸了武昌一带，9月24日对汉口与汉阳进行了轰炸^④，这使武汉三镇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日机的攻击目标为武汉的军事工业，蒙克利夫记录道：“在汉口和汉阳上空的飞机最多停留15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有超过1000人受伤，都是非战斗人员。其中有300到400人被杀或因伤死亡。（日机）攻击的目标大概是汉阳的兵工厂，汉阳和汉口本土城市最拥挤的地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⑤日机的空袭并未达成军事目标，于是轰炸无辜民众泄愤，蒙克利夫在公开信中写道：“根据我在这里的经验，报纸上的报道并不能公正地描述空袭后的可怕场面。在许多情况下，在炸弹落下的附近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目标。医院、难民列车和难民营、拥挤的住宅区和教育机构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⑥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机袭扰武汉次数增加，目标多为武汉的飞机场，蒙克利夫在1938年1月初的私人信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上周我们又遭遇了两次空袭。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被轰炸，但这两天机场都发生了火灾，几架飞机被炸毁。”^⑦《中山日报》报道日机在1938年1月5日下午由上海飞往汉口机场进行轰炸，对武汉三镇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但未提及日机炸毁中国军机一事^⑧。

1938年1月16日是新年以来日机首次较大规模的空袭，根据当时报纸^⑨与蒙克利夫的记录，日军出动五十余架军机，从武汉上空分三路袭击南昌、长沙与汉口北部，但仍未达到轰炸目的，仅有一组日机在孝感车站投掷20余颗炸弹。

①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p.35.

② 由美国传教士雅仁德(Rev.Arndt)夫妇于1913年在汉口设立的福音道路德会(The Lutheran Missouri Missouri Synod)。

③ 余程春、李静：《日机空袭武汉始于何时》，《档案记忆》2022年第5期，第47-48页。

④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军事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9页。

⑤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8.

⑥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9.

⑦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96.

⑧ 《中山日报》1938年1月5日，第2版。

⑨ 《申报》(汉口版)1938年1月16日，第2版。

1938年2月上旬,日机袭击武汉,目标仍为武汉的空军机场,日机的投弹准确率不高,故未造成严重的伤害^①。“炸弹被投掷到了整个机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排的烟尘标志着它们的路径。幸运的是,机场上没有任何东西被击中,尽管后来一些白烟表明有东西被炸飞了,可能是附近的一个席棚。”^②

1938年2月18日,日机对武汉的空袭以失败告终。根据蒙克利夫的记录,为报复“二一八”空战中的失利,日本又在3月14日、3月15日、3月16日三度对武汉发动了袭击,但并未有较大的战果。

1938年4月中旬,日军继续对汉口进行了一系列空袭,尤其是4月16日,日机袭击了汉口的南湖飞行场与汉阳兵工厂^③。蒙克利夫在家信中记录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月亮。如果可以的话,你不要在满月时的中国旅行,因为总是有空袭。上一次满月时,汉口发生了一系列空袭,从晚上11点持续到凌晨,第二天晚上又有一系列空袭,持续了三个小时。”^④1938年4月29日,汉口爆发了“四二九”空战,日机虽未对武汉军事设施达到打击目标,但对于汉阳沿襄河一带民众造成了较大伤亡,蒙克利夫在信中也证实了这一件事^⑤。

1938年5月至7月,日本飞机对武汉空袭的频率下降,原因有二:其一,日军正在为接下来的战争(武汉会战)做军事集结;其二,六至七月是梅雨季节,不利于战机在荆楚大地飞行,正如蒙克利夫在1938年6月12日所说的:“我们近两周是阴雨天气,鉴于日本人威胁要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这是特别幸运的事。”^⑥

1938年7月12日,十五架日机飞至武汉上空,日机对民房、医院与学校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本次空袭的发生地就在蒙克利夫的居住地附近,她在给密友Eva Skinner的信中写道:“昨天我们遭遇了一次可怕的空袭,飞机飞得很高,以至于他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标,一枚炸弹击中了省立医院^⑦的屋顶,炸穿了三层楼。唯一的病人来自产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炸死了。属于美国教会代表团的圣希利达学校^⑧被击中,但没有人死亡。博恩大院(Boone Compound)^⑨的外墙被击中,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基督教传教士协会^⑩周围一圈都被炸弹袭击,大约有两百人死亡,四百人受伤。”^⑪《申报》的记录亦佐证了蒙克利夫的话。“爆炸弹和暴雨一样,在东城一角,两分钟内落下一百个,无数的生命和建筑,随着那急骤的巨响,化作一个黑雾,直冲到天空里,又落到地上,凝结成一堆堆的血肉和瓦砾……省立医院一枚,毁病房及办公室、手术室,死五十二人,伤五十余人。”^⑫“据警局估计,死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负伤平民,约四百五十人,其中有重伤者二百三十七人,留居同仁,仁济,天主堂各医院及重伤医院内。被毁房屋一百〇五栋,被难户数约三百

①根据《申报》(汉口版)记载,蒙克利夫的此次记录为2月11日的空袭。“事后调查,余家湾,巡司河,武建营落弹十余枚,均堕田野河中,武建营烧棚户一间,震塌棚户两间,巡司河桥下炸翻一小划,死伤行人划夫及平民数十人”《申报》(汉口版)1938年2月12日,第2版。

②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2.

③《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16日,第2版。

④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23.

⑤由于“四·二九”空战大捷,全国的焦点放在我空军大胜日本飞机的捷报上,因此当时对于汉阳地区的人员遭受损失的报道不多。

⑥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6.

⑦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七一二”空袭发生后,医院被迫迁往恩施土桥坝沙湾梓桐巷。参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官网:http://www.rmhospital.com/a_overview/03.html。

⑧原名为“武昌布伦女校”,1874年由美国圣公会创立,1894年改为圣希理达女子中学,1938年迁往广西,1951年收归人民政府,原校址即今天的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

⑨即文华公书林(Boone Memorial School)。

⑩即汉口荣光堂。

⑪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1.

⑫《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13日,第23388号,第1版。

户，无家可归之难民至少在一千以上，美国圣公会所办之希理达女子中学，屋顶松有五十英尺长之美国国旗，敌机竟亦视为轰炸目标，集中投弹。”^①

1938年7月15日清晨，二十余架日机突袭汉口，城区遭受一定损失^②，正在汉口火车站等候列车的蒙克利夫亲身经历了这场轰炸：“汉口机场与汉阳兵工厂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我想(日机)总共投下一百多颗炸弹。我们可以通过城市不同地区的炮火来追踪飞机的路线，当(汉口)车站的炮火在我们头顶上轰鸣时，我们以为我们要遭殃了，然而他们却飞过去了，我们可以听到飞机的噪音和远处的狗吠声，这些声音渐渐消失。”^③1938年8月以后，随着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的失利，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次数越来越多^④。9月24日，蒙克利夫从成都返回武汉，在汉口短暂停留的一周内，她又经历了日军的一次空袭。9月30日蒙克利夫于武汉沦陷前离开汉口，前往上海。

根据她的信件与中文资料的记录，日机对于武汉的作战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中国空军与地面防空严密防守，日本人未能对武汉的机场、兵工厂等军事目标造成有效的打击，正如陈诚所言：“武汉方面因敌机屡次失败，日寇势必企图报复，固敌机日后轰炸武汉，自在意料之中。”^⑤日军的目的达不成，便将炸弹倾泻到无辜武汉百姓的头上，妄想通过无差别轰炸的方式使中国军民屈服。蒙克利夫亦总结道：“日本轰炸难民和非战斗人员以及医院，已经违反了所有的国际法，甚至是常理……在所有的骚乱中，没有士兵受伤，只有平民受伤。”^⑥

(二)关于武汉军民反空袭斗争的记录

“积极防空以摧毁敌人空军力量为主，如用空军防空炮施行射击等是。消极防空以消防、防毒、救护、灯火管制、交通管制，及避难等为要。前者属于国家之责，而后者非大多数民众共同努力不可。”^⑦1935年湖北省政府成立了湖北省防空协会，并编辑的《武汉防空展览特刊》。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以减轻损失为主旨的防空计划，《防空法》《防空读本》等基础性防空读物相继普及到各大城市。在日军正式空袭武汉前，武汉军民已为反空袭斗争做足准备。

1. 武汉积极防空的具体表现

作为一名外国人，蒙克利夫最为关注的是外援。上海沦陷后，中国空军的整体力量受到巨大的打击，同时，轴心国的教官的撤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汉空防的力量^⑧，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到来充实了武汉的空军力量。蒙克利夫记录道：“一段时间以来，我感到非常沮丧。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的士气已大不如前，我相信南京的撤离之所以如此突然，是因为在从上海撤退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危急的情况。中国空军在从上海撤退的过程中几乎被完全摧毁，日本人的不断轰炸足以让最勇敢的人感到气

①《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13日，第23388号，第2版。

②“香港十五日路透社电，据电话公司信息，今晨未能接通汉口之电话，因日飞机对汉口做出猛烈袭击之故云。”《新闻报》1938年7月16日，第10版。

③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4.

④同样是新西兰人的援华医生特雷梅万(H.C Tremewan)在当年8月21日的信件表示日机在八月的一周内对武汉空袭了四次，他记录道：“上周日(8月14日)日军对汉口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空袭...我在到达汉口之前，这里又发生了两次空袭，其中一次空袭波及医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我现在正在汉口基督教公医院，江对面就是兵工厂，我们将在一周以内搬家，今天早上有十七架日本轰炸机飞向兵工厂，这给我们带来大量的额外工作(指增加的伤员)”Evening Post, Volume CXXVI, Issue 69, 19 September 1938, p.7.

⑤《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7日，第23352号，第2版。

⑥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59.

⑦蒋愧吾主编：《国民防空须知》，上海：国民军事常识编译社，1937年，第23-24页。

⑧尤其是意大利教官的离开，对于武汉的空军力量有一定影响。Evening Star, Issue 22894, 28 February 1938, p.14.

馁。然而,更多的飞机从苏联赶来,情况全面好转。”^①

蒙克利夫在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两次中国空军作战的经典案例,分别是著名的“二一八”空战与“五·三一”空战。首先是2月18日汉口领空的空战,当天的空袭警报出现在12点15钟,蒙克利夫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星期五早上有38架日本飞机对我们进行轰炸,只有22架到达这儿。当他们准备离开汉口时,中国飞机从更高的空中出现打了日寇一个出其不意,在随后的缠斗中,不少于12架日本飞机坠毁,中国人损失了四架,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啊。”蒙克利夫对日军公布的虚假消息不屑一顾,她在信中表示:“我刚刚读了日本人对周五空袭的描述,他们说45架中国飞机中有30架被击落,他们会将自己的损失稍后公布。哈!哈!”^②

其次是著名的“四二九”空战,这场著名空战的胜利是武汉抗战中积极防空的表现之一,主要得益于中国空军战术的调整与防空情报的完备。4月29日正是裕仁的生日,侵略者为给天皇庆祝“天长节”,决定派大批军机轰炸武汉。中国空军早已提前部署好战斗序列,在日军到达武汉上空前就已升入高空。“那天是天皇的生日,每个人都觉得会有军事‘庆祝活动’。由于这个原因,这里的机场有比平时更多的飞机,甚至在下午2点25分左右警报器发出预警之前,第一批中国飞机就已经起飞。在我们的一楼办公室,我们看到40架飞机不断上升,直到消失无云的蓝色天空中。”^③由于视野的缘故,蒙克利夫未能亲眼看到这场载入史册的空战,她只能听屋顶上观战同事的解说。通过他人的解说与自己的判断,蒙克利夫认为中国空军在灵活性与技巧性上均胜过日本空军。

对于蒙克利夫而言,最令她钦佩的是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日本一事。徐焕升等八人在梅雨季节恶劣气候条件下,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起飞,途经南昌、衢州、宁波,跨越东海在日本长崎市上空撒下上百万份的和平传单^④。蒙克利夫盛赞了中国空军的英勇,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想到中国人在几个小时内可以完全摆布这些城市,但却没有投下一颗炸弹,真是太了不起了,日本人完全没有准备,没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当然,他们试图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但确实发生了,我认为中国人民的克制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典型。我想日本人不会比中国人更注意到日本人投下的传单,但那些有思考能力的日本人一定对中国人可以投下炸弹却没有这样做的事实印象深刻。”^⑤

蒙克利夫的信中也有诸多细节证明武汉市区内有数量充足的高射机炮,因为每当日军空袭时,除了空袭警报外,还伴有高射炮弹的爆炸声。蒙克利夫未在信中证实武汉的高射炮有成功击落日机的案例。但同时,在汉口访问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则见证了中国高射炮队的实力:“至于那些战斗机,只能看到象几个小黑点样的东西在空间飞舞着。忽然一只飞机的银翼闪了一闪,便迅速地跌了下来,一团黑烟在云霄间直降而下。”^⑥

2. 武汉消极防空的具体表现

消极防空是抗战时期武汉及至中国军民的主要防空方式,是当时中国薄弱的军事工业水平下的无奈选择,蒙克利夫书信中共涉及有四类消极防空的措施:防空洞、空袭警报、灯火管制与救护。防空设施则是防空袭斗争的物质基础。平民在日机空袭中的伤亡主要是由炸弹爆炸波造成的房屋倒塌、燃烧弹的灼烧、炮弹碎片的溅射与机关枪的扫射造成的,通过设置防空洞、防空避难壕,可以极大地降低人员伤亡。在蒙克利

^①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5.

^②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7.

^③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25.

^④《申报》,1938年5月21日,第23335号,第1版。

^⑤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2.

^⑥[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95页。

夫的信中,她常常提及每当日军空袭时,她与众人是如何在防空洞中度过的。

防空警报可以使军民在日记空袭前做好及时准备以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政府通常会以手摇警报器、汽笛、旗帜、火灾警报器、吊钟和广播的方式向军民通报。在蒙克利夫的记录中,武汉的防空警报总是及时的、准确的。

防空法令可为反空袭斗争提供法律依据,而武汉的防空警察则是防空法令的执行者,尤其是灯火管制与疏散民众方面。蒙克利夫曾盛赞了武汉的防空警察:“中国警察部门在空袭准备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好。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警告也有很大帮助,而我们通常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任何人都不允许上街,如果警察看到你站在窗口,就会进来命令你离开。如果是在晚上,发电厂的电闸就会关闭,不允许你点蜡烛,甚至不允许你抽烟。”^①

救护是指在空袭中与空袭后,对于被轰炸区军民的医疗救助事宜,它通常是“由市中的医院妇女青年团等团体为主”^②组织的。蒙克利夫也曾亲自参与过救护工作。武汉会战爆发以后,日军对武汉的空袭明显,汉口的青年女基督教协会举办了更多的急救课程,它与武汉的部分宗教团体组织了若干救护小组,在日军空袭后提供相应的急救。“当‘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起时,各小组就会在青年会总部集合,这也是所有小组的总部。官方的臂章被发放并被别上,急救包被分发,夹板也准备好,救护车的担架也被设置好。随后,卡车到了,各小组前往空袭现场进行急救,从废墟下挖出幸存者,安抚受惊吓的人,并尽可能地安慰那些正在为家人和朋友的突然惨死而悲伤的人。”^③

根据蒙克利夫的记录,武汉在1937—1938年的反空袭斗争在军事防御效果来看是较为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得益于国民政府的提前规划与有效组织,为武汉三镇的反空袭斗争提前筹备好相应的人力与物力;第二,积极防空与消极防空的有效配合,使日军难以对军事目标进行有效轰炸;第三,在武汉反空袭斗争中,中国军民与部分外国友好人士相互配合,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三)关于中国人的操守的记录

为了免于战争的波及,日本侨民于1937年8月前全部撤回国内,8月3日,守卫日租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离开汉口^④,中国军警接管这里后发现日租界囤有大量的假币与鸦片,用以危害中国人民与中国金融体系,即使这样,中国军警还是保护了日本人的私产,蒙克利夫在信中写道:“日本人只有一次重访了汉口,他们是乘坐轰炸机来的。与该市东区中国人看守的日本租界的和平与安全形成对比的是西区大量被毁的中国房屋的碎片。东部的日本房屋空空如也,西部无家可归的中国难民茫然地望着曾经的家园成为灰烬。西部城区的医院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东部地区的日本医院则静静地伫立在那,他们储存的基本药品在当前是非常需要的,却未动分毫。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对比了。一方面是最大限度的克制,另一方面是对生命和财产的肆意破坏。即使在日本空袭汉口之后,中国人也没有试图通过抢劫和射击日本的财产来进行报复。”^⑤蒙克利夫通过这一客观对比,传递出自己的两个观点:第一,向亲友说明英国在汉口影响的不断衰弱,以及她对于武汉沦陷前滞留此地的英国人(包括自己)未来的命运走向的担忧;第二,中国人民保护汉口的日租界的行为就当时而言是恪守国际公约的,克制的中国政府占有国际公理,日本对于武汉的空袭是藐视国联与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①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59.

^②军事委员会:《防展汇刊》,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印,1935年,第263页。

^③Evening Star, Issue 23198, 22 February 1939, p.15.

^④《新闻报》1937年8月9日,第6版。

^⑤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1.

二、关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的书写

蒙克利夫客居武汉后，便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工作，组织医疗用品分发到武汉的医院和救济中心，这使她对于武汉的医用物资情况相对了解，同时蒙克利夫与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合同中规定了作为秘书的她必须向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世界联谊会委员会提供月度报告，这些报告中涉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情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医疗救助

从1937年8月开始，长江流域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滞，进口货物的库存非常少，物资需要从非敌占区运来，成本与风险极大，黄油、糖与奶粉成为奢侈品，对武汉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显著影响。但最为可怕的是医疗物资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华中地区没有乙醚和氯仿的供应，自从日机开始空袭武汉后，大量伤员消耗了大量的医疗物资，迫使一些医院因为缺乏物资而被迫关闭。蒙克利夫曾说：“有些医院靠近战区，挤满了受伤的士兵和生病的难民，医院大院里已经搭起了帐篷，资源严重紧张。红十字会正试图协调中国和外国组织进行工作，以生产供华中地区医院使用的被褥、亚麻布、睡衣、敷料和绷带，特别是在武汉的这三个城市（汉口、武昌和汉阳），这些城市不得不收容来自上海地区的成千的伤员。”^①

1937年10月以后，武汉的医疗物资得到了补充，蒙克利夫在给国内的讯息中写道：“现在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货仓不再是空的。每天都有物资进来，物资出去。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大堆由农民合作社提供的稻草，用于填充枕头和床垫。旁边是成捆的吸水棉和手术用纱布。我们的柜子里装满了床单、枕套、绷带、吊带和医院用的衣服，这些东西都要溢出来了”^②

但是另一严重的问题接踵而来。著名新闻记者徐盈曾在1938年4月讨论过武汉的两大社会问题，即难民与伤兵的问题，随着日军向武汉一线的推进，高达两百万的难民与大量伤兵从各处涌入武汉，由于国民政府的动员不力，成为战时武汉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③。大量持械的伤兵从前线下来，这些伤兵降低了城市的治安情况，蒙克利夫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担忧：“他们在受伤后没有被解除武装，在康复后也没有被送回家或被征召回部队，他们可能会严重威胁到城市的和平安全。”^④

华中地区的难民问题得到了新西兰人们的关注，根据对蒙克利夫信件的发掘，我们了解到新西兰友人对当时华中地区的难民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华中地区的难民激增，为了帮助这些难民，新西兰红十字会的援华医生格雷(R.B.Grey)，辗转往返于汉口与郑州之间，他与汉口的同事从新西兰募捐到8000英镑的资金，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的报道，格雷医生从国内筹集的捐款与粮食足以救济至少一万三千名郑州的难民^⑤。

（二）传递讯息

日军在沦陷区实施了严苛的信息审查机制，导致战时武汉无论是接收外界信息还是向外传递信息都是极为困难的。“现在，我们的信件是通过船运到香港，再空运到汉口。几天来，我们连无线电和电报都无法使用。（因为）它们都在日本的审查之下”“从上海寄来的普通信件需要三周时间，我想二等邮件的时间会更长。我确实想念外国报纸和期刊。我们现在连上海的报纸都没有了，而且这些报纸（对我而言）也没有用，因为它们被日本人彻底审查过了”^⑥。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由于信息闭塞，蒙克利夫直到月底才知晓此事，她在给上任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长 Ethel Law 的信中倾诉道：“自日本占领南京以来，关于南京发生的最可怕的报告开始传来了。显然，日本军队的一大部分完全失控，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屠杀

^{①②④⑥}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1, p.82, p.82, p.81.

^③ 徐盈：《难民与伤兵：抗战后方的两大问题，武汉三镇处理的经过》，《华美》1938年第1卷第21期，第14-17页。

^⑤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年第37期，36-37页。同时，蒙克利夫也曾在信中提及格雷医生的捐助事宜。

和强奸事件，我将附上一份剪报，这是我们的信息来源之一。还有其他的消息来源，国际联盟和其他团体正在哭着进行调查，这表明这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受伤的士兵和医院的护理人员也在被屠杀之列，甚至安全区也被进入抢劫等等，这就彻底摧毁了我们认为日本军队能够控制局势或保证秩序的任何想法。”^①随着武汉开展航空邮件后，这种收发讯息困难的情况得到大大地改善，使蒙克利夫的书信能准时到达新西兰国内。

（三）反战宣传

1938年2月13日，汉口中山公园举办了反战游行，游行的人员高达数千名，这场游行是由蒙克利夫等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策划的，目的是与当时国联在伦敦举办的反侵略会议同步进行。蒙克利夫还观看过许多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编排的戏剧和电影，根据她在信中对于剧情的描述，蒙克利夫应该观看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抗战影片。蒙克利夫在观看完这些戏剧或影片后，对于中国人民愈发钦佩，她在信中写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可怕的苦难，但中国人民有希望，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②

三、蒙克利夫武汉抗战书写对新西兰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新西兰正值大选，加之国内对于日本侵略信息的匮乏，这使新西兰在最初是不了解中国整体情况的，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3年长城会战爆发后，不少关注国际事务的新西兰人均认为日本严重违背了国际公约。随着经济大萧条席卷新西兰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深，英国的绥靖行为让部分新西兰民众开始不满。热河战役发生后，蒙克利夫在给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秘书长 Stevenson 的信中指出，中日是邻居，“在他们学会如何成为友好的邻居之前，还会有冲突和分歧；我同情中国人民，他们维护着国家的荣誉，坚决抵制（日本对）长城以北无耻的领土吞并行为，我对他们失去热河感到深深的痛苦”^③。

七七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世界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但蒙克利夫传来的讯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日军试图掩饰侵略行为的企图。1937年8月，《奥塔哥日报》公开了蒙克利夫从江西牯岭发往国内的信件，该报道引用蒙克利夫的话向国内读者报道了战火中的中国：“对于那些在地狱中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要面对）食物短缺、数十万难民、熊熊大火和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和炮击，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④

在《奥塔哥日报》登载了蒙克利夫的信件和蒙克利夫继续从武汉发回讯息后，1937年9月28日，新西兰劳工联合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惠灵顿举行会议，会议审议了奥克兰和其他地方提出的抵制日本商品和航运的要求^⑤，并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抵制日货^⑥。次日，在日内瓦举办国联会议上，委员会拟批准一项谴责日军轰炸不设防的中国城镇并杀伤非战斗人员的决议，该决议草案并没有指明日本是侵略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委婉的谴责，竟遭到了英方代表的反对，作为新西兰驻国际联盟代表的新西兰工党议员威廉·乔丹(William Joseph Jordan)在会议中公开表示，新西兰人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都会谴责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行为，最后在乔丹与中国代表的据理力争下，委员会批准了关于谴责日军轰炸中国不设防城镇的声明^⑦。

1937年10月，蒙克利夫在《华中邮报》(Central China Post)上看到了一则报道，说悉尼的日本商会给

①②③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90, p.104, p.34.

④ Otago Daily Times, Issue 23304, 23 September 1937, p.18.

⑤ Nelson Evening Mail, Volume LXXI, 28 September 1937, p.6.

⑥ 《东南日报》1937年10月29日，第3版。

⑦ Gerald Chaudron, *New Zealand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Beginnings of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12, p.145-156.

惠灵顿的商会发电报，称关于日本在武汉轰炸的报道是“中国政府的虚假宣传”，这让她感到非常愤慨。10月10日，蒙克利夫写了一封长信，向新西兰国内的媒体告知了日军轰炸武汉事实的真相。“中国政府没有必要依赖于任何的宣传活动，事实本身的狰狞程度足以让人无法形容”“很难相信日机对非战斗人员的轰炸不是故意的”^①蒙克利夫更是在信中呼吁道：“我希望其他一些国家能组织一次抵制日本的活动，这将使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财政困境，使（日本的侵略活动）从根源上无法继续下去。”^②

当时大多数新西兰国内的主流报纸都将蒙克利夫10月10日的长信全文刊登，大多数报纸的新闻标题上都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例如纳尔逊晚报的新闻标题是《日军的轰炸—非战斗人员遭受损失—但中国人的士气没有被击垮》^③、《旺格努伊纪事报》的标题是《日本炸弹袭击—骇人听闻的暴行—非战斗人员被杀》^④、《奥塔哥日报》的标题是《对非战斗人员的轰炸—中国人的士气没有被击垮—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证据》^⑤、阿什伯顿卫报的标题是《轰炸城市—杀害非战斗人员—新西兰传教士的观点》^⑥等。

这些报纸向新西兰国内群众揭示，试图以无差别空袭的方式打击中国军民的士气。然而，日军的暴行非但没有动摇中国人民，反而使中国人民的抵抗决心愈发坚定。蒙克利夫的讯息显然得到了其国内同胞的关注，也激起了他们对中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因为她在当年11月底的信中写道：“知道新西兰的朋友们有如此多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情况需要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思考和祈祷。”^⑦

1938年，蒙克利夫的多封书信与报告持续不断地邮寄到新西兰，当年5月30日，蒙克利夫的朋友E. Watson（蒙克利夫曾多次与她通信）在惠灵顿新西兰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中讲述了她在汉口的故事，包括了她在汉口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空袭下的遇险经历等，新西兰《晚星报》盛赞蒙克利夫为“女中豪杰”^⑧。

蒙克利夫在家书与公开信中多次讨论过她对中国抗日战场未来走向的看法，并且她的分析还相当准确。1938年7月，《旺格努伊纪事报》节选了关于她对中国战场局势看法的最新信件，该标题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侵略者在斗智斗勇中落败》，这封信中主要涉及蒙克利夫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观察、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弱点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情况，蒙克利夫在信中向新西兰朋友传递出她对中国人民抗战持有的乐观态度：“斗争尚未结束，但中国有一种良好的精神，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以及自尊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事情。”^⑨

蒙克利夫在武汉的报告与书信向新西兰人民进一步揭示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本质，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壮举，她在信中多次表达了对英国绥靖主义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西兰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与同情，加深了新西兰人民的反日情绪。她和其他在华新西兰人发出的声音也促进了新西兰作为一个国家支持中国抗战，特别是在国联中支持中国关于采取集体行动以遏制日本侵略的呼吁。1938年4月，国际联盟奥塔哥分会在新西兰顺利召开，这场会议的主题是抗议极权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将分会决议的副本转发给英国政府首相、新西兰总理和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新西兰教育家弗兰克·米尔纳(Frank Milner)在本场会议中指出：“新西兰公民举办的本次会议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事侵略表示强烈抗议，这些侵略行为违反了庄严的条约，（法西斯）轰炸开放的城镇，无情地屠杀包括妇女和儿

① Ashburton Guardian, Volume 58, Issue 27, 11 NOVEMBER 1937, p.5.

②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4.

③ Nelson Evening Mail, Volume LXXI, 13 November 1937, p.13.

④ Wanganui Chronicle, Volume 80, Issue 269, 12 November 1937, p.7.

⑤ Otago Daily Times, Issue 23347, 12 November 1937, p.15.

⑥ Ashburton Guardian, Volume 58, Issue 27, 11 November 1937, p.5.

⑦ Barbara Francis, *You Do Not Travel in China at the Full Moon: Agnes Moncrieff's Letters from China 1930—1945*,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2.

⑧ Evening Star, Issue 22971, 31 May 1938, p.7.

⑨ Wanganui Chronicle, Volume 80, Issue 162, 12 July 1938, p.6.

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压制自由意见。”^①梅林顿牧师(Ernest Northcroft Merrington)则专门向与会人员讲述了中国人民与日军的作战情况，他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呼吁，他在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正勇敢地与人类文明的障碍作斗争，顽强地抵抗着日本恣意的入侵和来自空中的破坏^②。

四、对蒙克利夫及其武汉抗战书写的历史记忆

蒙克利夫武汉抗战书写首先是对她当时所历所见所闻的如实记录，其次也包含她在这一过程中关于经受苦难的感性记忆。“感性回忆是由冲动力、痛苦压力、震惊强度塑造的。不论你是否把它们重新召回意识之中，它们都牢固地滞留在记忆里。”^③对蒙克利夫来说，日军的空袭时间常常出现在能见度好的月圆时节，因此蒙克利夫常常在信中常出现“月圆之夜别在中国旅行”这样的句子，这是根植于蒙克利夫内心的恐惧。蒙克利夫数次在书信中提及过她曾在近距离直面日军空袭的经历，她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是对中国人民遭受苦难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蒙克利夫的信中一再反映出日本对于中国人民造成的杀戮之苦，她在1938年7月的书信中记录道：“周而复始地生活在那样可怕的苦难之中，却几乎无能为力，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所有的苦难都是由日本人那种可怕的兽性造成的。”蒙克利夫的书信与报道可视作是她对于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带来的破坏与屠杀的客观性书写，她将中国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与自我个体结合起来，并在后续的工作中不断反思并加深了对战时中国人民的同情之心。

当代新西兰人民没有忘记蒙克利夫的故事。1945年，蒙克利夫因病从成都回国，并成为新中友好协会的早期成员，她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新两国友好的事业。1988年，蒙克利夫去世，她的个人书信、笔记被捐献到了新西兰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蒙克利夫的忘年交，教师芭芭拉·弗朗西斯(Francis Barbara)于2007年开始整理蒙克利夫在中国期间留下的信件，并相继在新西兰大惠林顿基督教女青年会与维多利亚大学内部发行。新西兰书评人艾玛·约翰逊指出蒙克利夫在武汉的日子是独特与沉重的，她是这样评价蒙克利夫的信件集：“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了解到蒙克利夫那不平凡的一生，在这本书信集中，蒙克利夫引人入胜的写作、坚韧的个性相互交织在全球历史的转折点。”^④

2016年5月18日，芭芭拉在新中友好协会做了主题为“新西兰人艾格尼丝·蒙克利夫1930—1945年来自中国的通信”的演讲，将蒙克利夫的传奇故事讲给在场的中国友人^⑤。2017年，芭芭拉还接受了新西兰国家电台(Radio New Zealand National)主持人Kim Hill的专访，她向新西兰听众讲述了她与蒙克利夫长达三十年的友谊，并透露了许多蒙克利夫信件中未涉及的故事，她称居住在武汉对于蒙克利夫来说是“神话般的一年”^⑥。

一些当代新西兰年轻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纪念蒙克利夫。新西兰青年作家妮娜·波尔斯(Nina Mingya Powles)在博客上称她于2016年在华学习期间，曾前往上海、武汉回忆蒙克利夫在抗战中国的经历，她还专程前往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阅读蒙克利夫的书信，她认为蒙克利夫的书信是“新西兰人远离家乡并在遥远的地方写作的悠久传统”^⑦，蒙克利夫的经历引起波尔斯的情感共鸣。

① Otago Daily Times, Issue 23482, 22 April 1938, p.6.

② Evening Star, Issue 22939, 22 April 1938, p.5.

③ [德]哈拉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④ <https://booksellersnz.wordpress.com/tag/agnes-moncrieff/>。

⑤ 《新中友好协会惠灵顿分会2016年新闻简讯》，<https://nzchinasociety.org.nz/nzcfs-wellington-branch-june-2016-news-letter/>。

⑥ <https://www.rnz.co.nz/national/programmes/saturday/audio/201848727/barbara-francis-you-do-not-travel-in-china-at-the-full-moon>。

⑦ <https://pantograph-punch.com/posts/letters-Shanghai>。

结 语

蒙克利夫的武汉抗战书写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到 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10 月的武汉抗战，这些珍贵的书信的价值首先在于揭露了更多的战争细节，唤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武汉抗战之时，全世界武装反法西斯斗争的国家只有中国与西班牙，武汉抗战事实上代表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方向。1939 年 1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①而此前蒙克利夫的武汉抗战书写，无疑在促进新西兰较早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确观点并进而影响英美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蒙克利夫武汉抗战书写还展示了她在中国的心路历程。在居住汉口之前，蒙克利夫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年以上，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她有充足的时间与能力，和中国人、同情中国的新西兰人建立起通讯关系。早在热河战役与长城抗战时，蒙克利夫就已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蒙克利夫坚持留在武汉的动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蒙克利夫的故事是中新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她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中的个人境遇与武汉抗战书写应该成为当代中新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Moncrieff's Writing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Wuhan

LYU Hao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1931—1945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war against fascism and was closely wat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rom its inception. Agnes Moncrieff, the New Zealand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witnessed the entirety of the Wuhan'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in Hankow and wrote numerous letters detailing Japanese military operations between 1937 and 1938,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civilian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gainst Japan. Moncrieff's writing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Wuhan not only clearly exposed the brutal acts of aggression from the Japanese fascists and reflected the determination and ac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time, and reflected the deep sympathy and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people of New Zeal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to the war, and had a wide impact in New Zealand. Moncrieff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the idea of a world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in New Zealand, 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the anti-fascist war in the East and the writing of the Wuhan war should be a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for the people of New Zealand and China today.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Wuhan; Agnes Moncrief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riting; historical memory

[责任编辑 山阳]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48 页。